

# “孝教”思想的影響及現代的價值

—以韓國、日本為主

李庚子\*

<目 次>

- 一、孝教思想的影響
  - (一) 孝教對韓國的影響
  - (二) 孝教對日本的影響
- 二、孝教的現代價值
  - (一) 孝教在現代的道德價值

幾十年來，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視作為倫理教育內容之一的孝教<sup>1)</sup>的傾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考試為主，却把優良傳統丟掉了。重智育、輕德育；重分數、輕素質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現象導致了種種問題，例如目前世界存在的“道德真空”、“倫理不在”等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鑒于此，本文把傳統文化之一的“孝教”作為一項倫理教育着重提出來。在倫理教育的形式中，一類是通過傳授思想道德知識提高道德認識，另一類則是訓練學生的道德行為習慣。作為倫理思想之一的“孝”思想起源于中國，它不僅影響了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傳播到韓國、日本等東亞各國，成為這些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孝教思想占中心思想體系的這些儒家文化圈國家，孝也以統治思想及道德思想占有中心的文化傳統地位。本章考察孝教思想傳入韓國、日本的歷史過程以及其影響，進而闡明“孝教”在現代生活中的道德價值。

\* 高麗大學校 教育問題研究所 研究助教授

1) “孝教”是指“孝道教育”，即借助於對一定的代表孝的思想、人物、事件等的宣揚，使人們受感化而獲得教育，從而提高他們的道德品格，其對象包括全社會的所有成員。重孝的道德誘導必須要落實到孝行的標準和可資施行的理論上。

## 一、孝教思想的影響

### (一) 孝教對韓國的影響

孝是人行爲的根本，也是發展健康社會的精神的支柱。由于物質文化和個人主義的膨脹，導致了人性逐漸消失；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傾向抬頭，加上傳統的思想教育在內容方法上與現實的脫離，使得人們價值觀上的模糊問題得不到及時的化解澄清，導致了人們價值觀上的混亂。如今，很多的社會弊病都是因爲人們鼠目寸光、只顧眼前造成的。有一些青少年被金錢所迷惑，他們不但不孝敬父母，對父母漠不關心，有些人甚至成爲所謂的逆子。子女由父母所生，沒有父母就不可能有孩子。這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千古不變的真理。但如今，由于科學技術的片面發展、拜金主義的膨脹，人們却忘記了自己的“根本”。

未來社會更加復雜、千變萬化，單純的知識和經驗很難解決倫理問題。而且隨着信息化媒體滲入生活的各個方面，更需要確立正確的信念和價值觀。我們可以以重溫過去傳統的方式來解決現今的問題。就這一點筆者主張孝教。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早在20世紀初期特別是五四運動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就曾批判過傳統孝道，但現在人們又重新倡導作爲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孝。那麼人們爲什麼又重新拾起孝道呢？如今的孝究竟包括什麼內容呢？人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孝呢？現代倫理究竟面臨什麼樣的課題呢？以下我以韓國爲例，剖析上述問題。

#### 一) 作爲教化倫理的孝的歷史

早在公元前三世紀末古朝鮮准王任命衛滿爲“博士”，以掌管文化。據《三國史記》記載，高句麗(公元前37-668年)在其國初就已經編寫了史書《留記》一百卷，公元一世紀初，就有不少韓國人背誦《詩經》、《書經》、《春秋》等中國典籍。可見，公元前後時期漢文化在朝鮮已經有了相當高的發展，而這種發展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發展過程。

就儒家思想傳入問題，學者們議論紛紛，這裡不多論述。在韓國儒家思想直到三國（三國指高句麗、百濟、新羅）中期，才與韓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并融會到韓國文化的血脉中去。這時代可以說是孝思想的發展期。

三國時期，高句麗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漢字在高句麗得到進一步傳播，儒家思想也隨之傳入。儒家思想，原則上符合高句麗統治者的階級利益。因此隨着國內階級鬥爭的發展，儒家思想相應地被吸收，進而與高句麗的原有文化結合起來，成為高句麗統治階級加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公元372年，高句麗在中央發布“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王遣使回謝，以貢方物立太學教育子弟”，<sup>2)</sup>這是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專門教育王族和貴族子弟的國家最高教育機關。這是高句麗以國家的形式正式推廣儒家思想的開端。此後高句麗相繼採取各種措施積極吸收中國先進文化來充實自身的文化。

此外，在高句麗時期，還為一般百姓和地方地主豪門子弟設立庶民私學機關局堂。他們在這裡學書、射、五經、《史記》、《漢書》等。《舊唐書·東夷傳》記載：“俗愛書籍，至于衡門廝養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于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由此可見，高句麗通過在太學和局堂傳授經典來進行孝教。

漢字傳到百濟(公元前18-663年)的最初時間不詳，但《三國史記·百濟本紀》記載：“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百濟早已有毛詩、醫、易、五經博士等著名儒學家，他們均得到博士稱號。公元四世紀後半期到五世紀初，博士王仁到日本傳授《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博士高興在541年編寫了百濟歷史《書記》；百濟又從中國南朝時期的梁王朝請來了“毛詩博士、涅槃(佛經)等經義并工廠、畫師等”。這些給百濟的儒學、教育和工藝美術等各方面的發展都帶來了巨

2) 設“太學”具有儒學到經學的學術的體系。高句麗的“太學”是文獻記載的最早的大學，之後儒學大學的變化過程如下：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太學、新羅神文王二年(682)國學、高麗成宗十一年(992)國子監、高麗忠烈王元年(1275)國學、高麗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成均監、高麗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成均館、高麗恭愍王五年(1356)國子監、高麗恭愍王十一年(1362)成均館。朝鮮時代，成均也被稱為太學、洋宮、賢關、芹宮。參見韓國教育史研究會編：[韓]《韓國教育史》，서울：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3版，第27~28頁。

大的影響。由此可見，百濟雖沒有特定的教育機關，但從給日本傳《論語》和《千字文》的記載來看，它也是通過經典來進行孝教育的。

新羅地處朝鮮半島東南部，發展較晚。公元六世紀前後，新羅(公元前57-935年)在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高句麗、百濟之間的矛盾，逐步擴大自己的勢力，最後占据了漢江下游地區。新羅同中國各王朝直接取得經濟文化聯系，并大量吸收了中國文化。新羅接受外來文化比高句麗、百濟要晚一些，但真興王(534-576)時出現的世俗“五戒”，已經把忠、孝作為其首要內容，從這裡完全能夠推斷儒教的源流。在六世紀，新羅在其主體實踐中已經吸取了儒教思想。新羅真興王在積極推行擴張國力的政策下創設了“花郎道”。<sup>3)</sup>“花郎”是由15歲到18歲的青少年子弟組成的組織。由于受到高句麗的擴張主義和百濟的征服政策的刺激，新羅本着加強自身力量之目的組建起“花郎道”。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于家，出則忠于國，魯司寬寇之旨也。”從這裡可以看出花郎制度的性質及思想特征。花郎徒的教育內容主要是世俗五戒。五戒即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有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其目的是培養花郎徒的品德，以及在家庭、社會、國家中的生活規則，這些都是當時新羅社會所需要的。還有《三國遺事·興法第三·彌勒仙花未尸郎真慈師》記載：“自此使人悛惡更善，上敬下順。五常六藝，三師六正，廣行于代。”<sup>4)</sup>花郎教育通過給花郎知識和忠、孝教，以培養治理國家所需之人才。花郎的思想是新羅特有的思想，它在新羅全盛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它以不可缺少的功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羅設學術機關，是從三國統一後的神文王二年(682年)在禮部下屬設置國學開始的。<sup>5)</sup>景德王六年(747)，把國學改為“太學監”，惠恭王又改稱“國學”，設置各科博士及助教，把《論語》和《孝經》做為共同必修課，把《禮記》、《周易》、《左傳》、《毛詩》、《尚書》、《文選》選定為選修課。入學者為15至30歲的貴族子弟，教育年限是九年。如果學生才質不慧，沒有進步，即讓退學；如果才質好，理解能力尚不成熟，即

3) [韓]《三國史記·真興王三十七年》：“此花郎國仙之始。”

4) 所謂“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三師”是指太師、太傅、太保；而“六正”則指持正確態度的六種大臣，即聖臣、忠臣、良臣、智臣、貞臣、直臣。

5) [韓]《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神文王二年條“六月立國學置卿一人”。

使超過九年亦容許繼續學習。國學完畢，根據知識程度選拔官吏。從這裡可以看出對儒教的教育思想的重視。

新羅的元聖四年(788年)施“讀書三品科”制度，實行國家考試录用官吏。分三等級，稱為“讀書三品”：“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sup>6)</sup>并特別強調他們所學習的儒家經典都是高水平的儒教倫理典籍。由此可見，當時的新羅已經普遍推行孝教了。新羅從政治、教育直到生活倫理推廣了儒教，統一新羅是把忠孝等儒教實踐精神作為基礎的。通過系統化的教育，使儒教深深扎根于新羅社會。

高麗(918-1392)為了預先選拔國家所需要的具備領導才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的人才，就需要設立教育機關，即建立培養官僚的大學。成宗十一年(992年)在中央設置國子監和東西學堂，在地方以鄉校、書堂為骨干，其中國子監是研修政治原理、培養人才的教育機關。成宗提出《高麗史·選舉志·學校條》：“凡理國家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這就是說，把以忠孝為基干的儒教倫理成為全體國民所要崇尚并實行的一種倫理。孝被理解為人的社會本性之基礎，忠國之前提。鄉校是地方性學校。鄉校的教育課程以制述、明經(包括孝經、論語、九經)為主，也有醫學、律學、算學等。書堂是非正式的私學機構，為入學鄉校準備，也普及庶民的子弟的教育機會。書堂的學習內容以講讀《千字文》、《童蒙先習》、《通鑒》、《小學》等為主，并按學生的能力決定教科目。這對庶民教育影響很大。這些教育機構均以儒家經典來教授孝之思想。

高麗提倡孝思想還從制度上對孝行者給予種種優惠，其中之一就是綜暇制度。即官吏拜見其父母給予休假的制度。其中，有照顧生病父母的休假、奉養老父母的休假、行喪的休假、遣喪和祭祀的休假等。高麗仁宗(1122-1146)時，規定凡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各校學生“皆先讀《孝經》、《論語》”，且“必令兼通”。<sup>7)</sup>另外，高麗國家積極表彰孝行，讓地方官吏調查當地的孝行，按孝行的程度對孝行者給予酒果、布帛、糧食等物品。不僅如此，還可以免除其徭役。

眾所周知，朝鮮時代是儒教社會。在朝鮮時代(1392-1897)，以孝為中心的倫理教

6) [韓]《三國史記·新羅本紀》。

7) [韓]《增補文獻備考·學校考一》

育之所以能給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其原因之一就是朝鮮時代的儒學的影響。在朝鮮時代，儒學思想不僅作為生活倫理而且作為社會政治制度和教化百姓的原理強加于百姓社會。朝鮮教育機構作為官學有成均館、四部學堂、鄉校等，作為私學有書院、書堂等。在朝鮮時代，成均館是最高學府，並設立了四部學堂和鄉校、書院用來進行忠與孝的教育。童蒙主要讀《千字文》、《類合》習字，之後讀《童蒙先習》、《擊蒙要訣》等。《童蒙先習》是廣泛使用的兒童教科書，介紹五倫的價值並首先強調孝的基本觀念及模范例子。朝鮮王朝比其他王朝更重視孝思想，在政策方面把孝作為統治的根本。統治者認為充分地遵守孝，就能維持社會秩序。朝鮮時代把《小學》<sup>8)</sup>納入為科舉考試內容孝治政策之一，把《孝經》和《小學》寫作倫理教科書，另外還主力編撰《三綱行實圖》。<sup>9)</sup>

為了教化鄉里的民衆制定，“鄉約法”，引導庶民樹立孝風。鄉約的道德綱目是“德謂孝于父母，忠于國家，友于兄弟，弟于長上……”等的內容。當時，這樣的“鄉約”形式較為普遍。為了實現儒教的生活化、根本化，實行鄉約制度，從而指導孝思想。《孝經》受到朝鮮歷代統治者的尊崇。統治者褒獎孝子，意在提倡孝道，樹立楷模，促成社會孝親尊老的風尚。

由此可見，在朝鮮以化民成俗為重要手段弘揚孝。朝鮮時期的孝教以《孝經》、《三綱行實圖》、《小學》等為教材。在朝鮮統治者大力表彰孝行。為了在社會上倡導孝道，朝鮮時代的統治者共歷27個人中21個人諡號多加一“孝”字。除太祖、燕山君、光海君、孝宗、高宗、純宗外，皆有“孝”字。例如，定宗諡為“順孝”、太宗諡為“光孝”、世宗諡為“明孝”、文宗諡為“聖孝”、端宗諡為“敦孝”、世祖諡為“仁孝”、睿宗諡為“昭

8) 另外《小學》，英朝時《小學》被重編譯刊行為《御制小學諺解》。其後的朝鮮後期，實學者李瀾對《小學》中的難解句進行解注，其著作有《小學疾書》。丁若鏞也編著了《小學枝言》，對《小學》中的疑難點和難解部分加以說明，並寫了自己的見解。純祖時期，朴准源刊了《小學問答》。這本書記錄了給太子講授《小學》過程中所問答的內容，是在1802年發行的。到朝鮮末期高宗年間朴在馨選擇《小學》中重要的部分，並在這裡加上韓國的儒賢的嘉言、善行、忠臣、孝子等故事，編寫出刊了《海東續小學》。該書是強調儒教的既而又實踐性的學問的修身書。這不僅被儒生所喜讀，同時也被百姓所喜讀。它在整個朝鮮時期，為普及以忠、孝為中的內容的儒學倫理觀，做出了極大貢獻。之後，張寅植編寫了《小學問答》，該書編取《小學》中的女人教育有用的部分。甚至，金宏弼特注重于《小學》重要性的教育並自稱“小學童子”，是因為他認識到躬行《小學》所體現的修身之修己，是以義理實踐為必需的前提條件的孝教的基礎。

9) [韓]《三綱行實圖》描寫“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此來教育人們忠、孝、貞節等道理。此書把中國與韓國有名的忠臣、孝子、熱女的事實繪成圖畫，並配以簡要的說明。

孝”、成宗諡為“恭孝”、中宗諡為“誠孝”、仁宗諡為“欽孝”、明宗諡為“敬孝”、宣祖“達孝”、仁祖諡為“純孝”、顯宗諡為“彰孝”、肅宗諡為“元孝”、景宗諡為“宣孝”、英祖諡為“顯孝”、正祖諡為“庄孝”、純祖諡為“成孝”、惠宗諡為“哲孝”、哲宗諡為“英孝”。孝思想對韓國的影響，可以說歷史悠久、範圍廣泛，并已經成爲韓國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礎之一。

## 二) 孝教的現今狀況

孝教最重要的作用是協調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人和人之間理想的關係和態度是互相友愛、共同奮鬥，這樣的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又受到家庭、學校、社會等各種正式、非正式因素的綜合影響。學校教育雖然起着主導作用，但它不能完全控制和掌握學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全過程。只有把學校的系統教育與良好的家庭教育 and 社會教育組合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才能形成一個完備的德育及管理的體系。那麼，如今在韓國怎樣進行孝教？

在韓國每年五月份可稱爲“家庭月”。因爲5月5號是兒童節、5月8號是父母節、5月15號是教師節。所以在5月感恩父母的活動特別多。這時各公司、家庭、學校、民間團體都會有特別的活動。“父母節”那天，子女們通常會送給父母表達自己孝心的禮物，早上給父母送上康乃馨或者一封信。或者由子女出錢，資助父母、長輩外出旅行。現在還有些人跟父母一起去旅行或跟父母一起去照相館照紀念照。在那天，人們用各種方式向父母表示一份感恩的心。

在學校，老師們會給學生留作業，例如寫孝日記、寫信、自己動手做溫馨的禮物、給父母畫像等。韓國的小學、初中、高中分別設置公共必修課《端正生活》、《道德》、《倫理》科目，作爲選修課、在高中時有《市民倫理》、《倫理和思想》、《傳統倫理》，這些課從家庭生活倫理入手，抓青少年的倫理道德教育，強調孝、悌、忠、信等韓國傳統美德。此外，在韓國京畿文化財團、京畿道孝文化實踐研究會爲小學、初中特別制作強調孝教實踐的有趣的故事。針對小學生的《孝實踐！美好社會的基礎》里介紹孝的涵義、孝教的實際等，針對初中生編制《恭敬、愛》里介紹孝教的必要性、孝教的方法、孝教的情況等。這些都具體介紹孝教的實踐方法，包括怎麼對待年長者、父母、

老師等基本的禮貌。其實踐方法中包含表示感恩、理解父母，使父母開心、制作孝行家庭報紙、介紹調查孝行實踐、發表孝書之讀後感等。

至于社會對孝的政策，1973年國家制定了孝行褒獎制度，由保健福祉部管理。褒獎行孝模範、對老人有很大貢獻的人、傳統模範家庭等。褒獎的種類有總統獎、國務總理獎、保健福祉部長官獎等。孝行者都是各種團體推薦，并通過嚴格的檢查選拔來確定。國家按孝行程度給予不同褒獎。民間文化團體自發地舉辦各種褒獎孝行的活動。大學也采用一些不同于考試的其他特殊的錄取方法。由高中校長推薦，并根据推薦招收一部分孝行者為學生。1982年5月8日發布《老人憲章》，<sup>10)</sup>開始制定敬老周。在敬老周期間開展為老人服務的活動，各個社會團體慰問在敬老院和其他委托老人機構的老人。這都是維持傳統的孝思想的政策。孝在韓國是最貼近民衆生活的話題。新聞媒體以它的快捷性與廣泛性，時常播出“孝道商品”、“孝道保險”、“孝女歌手”、“孝子女家長”、“孝道旅行”、“孝道馬拉松比賽”等節目，報道有着不平凡孝行的普通人來弘揚孝道與互助友愛精神。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都按孝文化傳統來思考和行動。孝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孝思想在韓國思想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它對韓國社會發揮着廣泛的影響，成為規範思想道德、維系社會關係的強大的精神支柱。

## (二) 孝教對日本的影響

孝教思想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裡僅側重談談中國孝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中國儒學經韓國而到了日本。公元285年，日本應神天皇之太子菟道稚郎子拜

10) 《老人憲章·敬老憲章》：“老人養育了我們并創造繼承了文化，從而為國家和社會的安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他們有權受到國家的尊敬，度過快樂的人生暮年。但，人口的老齡化現象以及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的變化，使老人的養老生活更加艱難。韓國民族是擁有敬老孝親和鄰保相助得優良生活的民族。我們應該發揮過和優良傳統，敬愛和奉養老人，使之愉快地過上晚年，即我們要致力於養老福祉事業。

我們要努力實現以下條款：第一、在家庭發揚傳統美德，子孫要盡心盡力奉養老人，同時地方社會和國家大力扶持這項事業；第二、老人在衣、食、住等方面，要過上充裕和安樂的生活；第三、老人享有身心的平安和健康；第四、老人有權利根據自身的能力，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第五、老人可獲得與娛樂生活以及需要老年生活的知識的機會。

百濟的王仁爲師而學《論語》十卷與《千字文》一卷。<sup>11)</sup>這是中國儒學典籍傳入日本的最早記象。此後，百濟的五經博士紛紛到日，儒學的主要經典得以傳授，關於儒學的知識可能已開始普及。

儒學傳入日本及儒學家來到日本後，首先在宮廷里開辦學問所，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阿直歧和王仁爲師，學習中國的經典。日本有些學者認爲，這是日本宮廷教育的起源。除皇太子之外，皇族和宮廷貴族的子弟也到這里求學，學習漢字和漢學，這就產生了學問所的教學組織形式。當時尚無學校這個名稱，它是一種有組織的宮廷教育。此後，公元513年(繼體天皇七年)百濟五經博士段楊爾等來到日本；繼此之後還有易博士、醫博士、歷博士相繼來到日本。這樣，宮廷中的學問所就繼續保持下來了。<sup>12)</sup>

從7世紀開始，中日兩國互派使者，研究儒學經典，并攜帶走了大量的儒學典籍回國。7世紀初期，聖德太子制定憲法，吸收了《孝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等思想。701年制定的《大寶律令》，標志着日本教育法令的誕生，確定了日本教育的發展方向。《大寶律令》，規定把儒學作爲一門重要課程，在大學或國學內講授以博士和助教爲教師。學生治一經或二經者，必須同時兼通《孝經》與《論語》，不通者，以不合格論。不僅全面規定了日本的學校制度，也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有明文律令。

在奈良時代(710-794)《大寶律令》得到了徹底的實行。儒家的制度思想被引入日本之後，爲律令制度的推行和實施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說明，使社會制度獲得了一種新的文化資源的支持。在奈良時代深受盛唐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儒學也被日本政府極力推廣。大學、國學以儒家經書爲主課，用儒家思想培養各級官吏。中央設大學，地方設國學，形成了較爲完整的學校系統。這些學校的主要功能是培養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官吏。主要學習內容是儒家經典，所以各類學校也就自然成爲儒學的傳播系統。根據《大寶律令》中的《學令》，京城設“大學寮”，其性質既是官立最高學府，又是全國最高教育領導機構。大學寮的入學資格有嚴格的等級身分限制。五位以上官吏的弟子可以入學，其他子弟需要特別的審批後，方可入學。進入大學寮無須考試，學習期限9

11) [日]《古事記》三卷成書于712年，這是日本第一部書面文獻。其“卷中·應神天皇”條曰：天皇命令百濟國說：“若有賢人，亦上貢。”按照命令貢上來的人，名叫和邇吉師，隨同這個人一起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和邇吉師是文書之首長等的祖先。參見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0頁注153條。

12)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頁。

年，入學年齡規定為13歲以上，16歲以下，修業時間不限，只要學完規定的課程，經過官吏奏用考試及格就可以畢業。教授傳記、明經、明法、算術等學科，課程大多數以儒家經典為主。大學寮設官員、教官、博士、助教等，博士和助教講授經學并負責考試。大學寮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天皇制國家所需的國政的官僚。因為天皇制的中央集權體制是根據儒家的社會思想進行運作的，所以官僚們必須熟讀儒家經典，才能起草相關的詔敕或奏狀。

在地方各國設立“國學”。“國學”由“國”一級的政府機關管轄。《大寶律令》規定，地方的行政區分為“國”和“郡”兩級。全國分為六十多個國，歸中央直接管轄。“國”一級的地方官叫做“國司”，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郡”是國的下屬地方行政區別，其地方長官叫做“郡司”。“國學”是為地方的上層人物子弟設置的，其入學資格原則上以郡司的子弟為主，如果不滿招生定額時也允許庶民子弟中有才華的人入學。國學的教育方針，學科和課程設置、考試方法及學生的推荐等，和大學基本相同。國學也以儒學為主，經學占重要地位。但在國學中也可設醫學、藥學。在國學中講授經學的教官叫做“國博士”。<sup>13)</sup>奈良時代的大學，最重視儒家經學，以經學為主課。這種課程調置辦法，并不符合對官吏的才能提出的要求。718年制定的養老律令的“學令”規定在大學或國學所修經書中，《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毛詩》、《儀禮》、《周禮》為中經；《周易》、《尚書》為小經；學二經者須學大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二種，學三經者須學大中小經各一種，學五經者須選學大經二種及中小經三種，《論語》、《孝經》則為全體必修。而《日本書紀》(720年修成)中散見的各種政治思想，實際上已超越了經學的范围，涉及到更廣闊的領域。

由此可見，在奈良時代，大學的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學為主通過經典在教育上提倡儒學、強調孝教。中國儒學的主要著作已經傳達于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儒家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理想、道德人格等直接刺激了日本大一統天皇制國家的形成，使日本進入到第一個律令制國家時代。日本上層社會一般視中國儒學為統治階級必備的一種文化修養。儒學在日本由初傳進入了實際應用的階段。儒學的傳入不僅對日本的封建化過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適應日本社會的實際，從一開始就發生了富有意義的革

13)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

新。可見，中國儒學在日本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不難看出日本化了的儒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對於日本民族和社會的影響巨大而且深遠。

在平安時期(794-1192)，在平安時期官辦的大學和國學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私學得到了發展。在許多私學中，主要私學有“文章院”、“弘文院”、“學館院”、“獎學院”、“勸學院”等，這些都是貴族的教育機構。其中，“弘文院”創辦較早。“弘文院”於公元782年和氣廣世創立。又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創建“勸學院”，創辦的目的是想通過救濟的途徑，使更多的同族子弟能夠接受教育。同時出現空海和尚在828年開創“綜藝種種智院”，這是庶民子弟的學校。該校所設課程不只限于佛學還包括儒學，在學術方面提倡自由研究。到了平安後期，私塾形式的私學終於代替了官學，教育得到了一定的普及。經過奈良、平安時代的幾百年間，儒學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在各類學校中通讀《論語》、《孝經》之類的儒學經典，可以說就是他們的知識教養和身份地位的重要來源。

到鎌倉時代(1192-1333)和室町幕府時代(1336-1573)在日本社會處於封建割據的動蕩時期。戰亂不斷出現，各階級勢力的鬭爭十分激烈。天皇制逐漸削弱和瓦解過程中武家政權發展起來。所以天皇的地位雖然存在，但已形同虛設。從教育方面來看，與寺院教育并行的武士教育隨即發展起來，私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發達。所謂“武士道”是隨武士階層的抬頭而出現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念，經平安時期醞釀，到鎌倉時代轉成武家時代的政治思想。他們的道德觀同宮廷貴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長制為中心的一種主從間道德規範。最早是由平安時代構成武士團的家長和“家子”、“郎党”間通過主君恩賜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恩”)，以及家臣則對主君失志忠節(“奉公”)的這種權利義務關係產生的。幕府時代，在鎌倉將軍、執權同御家人之間，這種觀念有進一步的約束性，主從關係比父子、夫婦關係更重要，違反這種關係要受嚴罰。武士道的內容就是以這種家臣對主君的“忠節”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輕生、愛名尚義的精神，養成重視禮儀修養、儉約寡欲、以清廉自許，鄙視平安貴族優柔文弱的習氣。<sup>14)</sup>所以，古代的貴族教育衰落，大學寮和國學沒有得到恢復，代之而起的是武士教育和寺院教育，享受教育的階層比以前更加廣泛。這時家庭與寺院是武士教育的主要場所。寺院

14) 吳廷璽主編：《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教育與武士家庭教育聯系起來。在寺院里武士的子弟六、七歲開始讀《孝經》、《千字文》、佛典等，還學“假名”、詩歌等。“武士道”教育是日本孝教思想上的重要轉折點。作為孝教思想進行武士教育和寺院教育。

到德川時代(1604-1867)是日本歷史上儒學最為盛行的時代。德川幕府繼承鎌倉以來尊崇武士的傳統、竭力維護封建的身份等級制度，用以鞏固武士的專制統治。武士階層用武力分割統治全國人民的政治形態，稱為幕藩制。幕藩體制的社會，階級統治以嚴格的身分制為支柱。進入幕府時代以後，隨着父權家長制家族的確立，中國儒家的倫理綱常也日漸深入日本社會。鎌倉幕府的法律《貞永式目》制定的宗旨就是吸收儒家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倫理教化的根本，實現“臣對君要忠，子對親要孝，妻對夫要順從”。孝敬父母始被作為武士的道德準則。從室町時代起，武家社會家族秩序的混亂往往引發社會動亂，所以，家長制原理的“孝”與主從原理的“忠”均被認為是重要的道德。以強化家長的統治加強了對孝道的推廣。到德川時代，隨着儒學的興盛，孝道得到全面提倡。德川幕府“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孝為百行之本這一儒家道德，已經不僅是貴族和武士的道德準則，而且普及於民眾之中。德川綱吉執政時，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布告牌，用以表彰忠孝，懲罰不忠不孝者，并讓御用文人編纂關於孝子的傳記，廣為宣傳。武士階級掌權以後，把中國儒學推到了極盛，尤其是三剛五常、忠孝和禮的學說，得到了廣泛傳播。

德川時代的教育機構大體上有幕府直轄學校、各藩的藩校、平民的學校教育可分為“寺子屋”、“鄉校”和“私塾”。“寺子屋”是專門為平民子弟開設的初等教育機關。“寺子屋”由室町時代僧侶所設蒙學演化而來。這個名稱，在德川時代才有，但這種教育設施早在平安時代已經有了。它起源于寺院向貴族子弟開放，對世俗貴族子弟實施教育。經過鎌倉時代和室町時代，逐漸盛行起來。鎌倉時代以來寺院兼有教育機關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學，學生稱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數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醫生、神官、僧侶等也設塾，仍沿用舊名“寺子屋”。寺子屋的開設管理者和教師為“師匠”。小的寺院專門承擔世俗子弟的教育。寺子屋的教育內容，從實用的觀點出發，進行讀、寫、算的教育。幕末，這種寺子屋得到普及，享受教育的階層比以前更加廣泛。

平民教育機關除“寺子屋”外還有“鄉校”。“鄉校”是農村里的初等教育機關，它和

“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諸藩直接計劃監督設置，或由藩內有權勢的人出錢設立，或經幕府藩廳批准由民間有志之士設立。教育對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鄉校重視道德教育，教學內容主要是讀、寫、算等日常生活必須的知識。因鄉校是公費開辦的，開設不多，天保年間(1829-1843)只有13所，寺子屋却有1987所。<sup>15)</sup>在德川幕府末期，私塾也發展起來。私塾是一些學者私宅設立的高等專門教育設施，所以稱為私塾。私塾沒有任何統一規定，有的專門教授儒學，這樣的私塾居多；也有的傳授國學，還有的傳授洋學和醫學。教育時尊重學生個人的要求，不採取統一的格式。大多學生自願入學，沒有學年和年齡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私塾在發展日本近代高等專門教育上是有貢獻的。<sup>16)</sup>上述幕府末的學校，從教學內容上看，主要是儒學教育，平民的教育也有較大發展、普及各類民辦學校。

鎌倉時代朱子學隨神宗傳到日本。德川時代朱子學影響最深廣的是宣揚理學的封建道德。不用說當時日本普遍的學校—“足利學校”，<sup>17)</sup>連社會上普遍的教育場所寺子屋里使用的訓蒙讀物也幾乎都充滿這些內容。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各種：

第一、兒童讀物：宣揚“三綱五常”一類思想，有《大和小學》、《本朝三字經》、《和俗童子訓》及《民家童蒙解》等幾十種。第二、婦女讀物：鼓吹“賢妻良母”、“貞女烈婦”，用“七出”的法紀使婦女遵守“三從四德”的有《女論語》、《女大學》、《女中庸》、《女五常訓》、《女仁義物語》、《本朝烈女傳》等幾十種。第三、武士讀物：有《武士訓》、《武教小學》、《士道要論》等幾十種。第四、宣揚忠孝介意、節義的讀物：忠義方面，有《皇和表忠錄》、《赤穗義人錄》、《烈士報仇錄》等十幾種。孝義方面，有宣揚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肥前國孝子傳》、《本朝孝子傳》等十幾種。宣揚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鑑》、《大東婦女貞烈記》、《古今烈女》、《本朝烈女傳》等十幾種。此外，中國倡導封建倫理思想的《朱子家訓》在日本流傳很廣，

15) 吳廷璽主編：《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頁。

16) 詳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

17) 關於儒學在地方上的傳播，特別應該提及的是，設在關東地區的足利學校，它是室町時代漢學教育的中心，對於儒學普及地方發揮了特殊作用，也為此後日本的統一和江戶時代儒學的全盛做了必要的精神準備。足利學校培養的學生大致有兩個用途，一是成為武將的顧問。足利學校漢學教育的重點是易學。完成學業後，學生為武將行占筮，觀戰陣，講兵書，有兼才者也施醫療。第二類學生畢業後回到地方進行教學。詳見王健：《『神體備用』的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6頁。

也為日本封建教育的確立起了重大的作用。<sup>18)</sup>無論是足利學校，還是為一般民衆所設的寺子屋，使用的訓蒙讀物都與朱子學有關。朱子學已基本上承担着道德秩序建構的文化使命。

在中國的朱子學中，“孝”能夠一直優先於“忠”。相反，在日本幕藩國家，大名只有通過成為將軍的家臣，武士只有通過成為大名的家臣，才能成為封建領主。所以，孝與忠的理論不得不予以變易。<sup>19)</sup>日本朱子學強調忠孝一體，忠孝一體認為君父之義是同一個，孝子之門必有忠臣。與中國朱子學不同的是，日本朱子學更提倡忠本主義，忠為五倫之首。這樣的朱子學作為教育的一種思想體系，把幕府所規定的現存秩序作為天命加以合理化、固定化。各地的武士和平民直接忠於幕府將軍，而將軍忠於天皇。及至德川幕府末期，那種以武士子弟為對象，以儒學為教學內容的高等教育，受國內外各種形式新變化的影響已呈衰勢。德川時代以前，學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德川中期以後學術思想昌盛，學派林立，學校教育越來越發展，學校和各類教育機構越來越增加。教學內容有經書、歷史、詩文，教科書指定為孝經、四書、五經。不過至幕府末年，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昌平坂學問所的課程也進行了改革。

就武士的學校教育而言，分為幕府設置的直轄學校和各藩設置管轄的藩校兩個層次。幕府直轄學校是為幕臣的子弟設置，培養輔佐幕府的官吏和實務人才的教育機構。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內，先後設置的幕府直轄學校有二十一所，每所學校各有不同的職能和教育內容。最重要的最早成立的是“昌平黌”。昌平黌也稱為昌平坂學問所，是德川幕府時代儒學教育的最高學府。它的前身是1630年在德川幕府支持下有林羅山創辦的書院。1686年，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賜予稱號為“弘文院”。從此，成為林家的私塾。1691年德川幕府授權給林氏家族指導祭孔典禮和管理學校，并把這所私塾歸幕府直接領導，改名稱為昌平黌。1793年，幕府對於該校的招生對象、教學科目、修業年限等都做了明確規定。按照這個規定，招收學員的對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級武士)、“御家人”(下級武士)的子弟。教學內容包括有經書(四書、五經、三禮)、歷史(左傳、史記、兩漢書、通鑑綱要)、詩文。教學方式，首先是“素讀”(光念不講)，指定的教科書講釋，使用的教科書以關於經學方面的為主；再次，以集

18)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29頁。

19) 三宅正彥著、陳化北譯：《日本儒學思想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頁。

體討論的“會讀”和“輪講”為主，進行專門的自由研究，採用質疑的方法。<sup>20</sup>這是一所直接由幕府經辦的高級學校，培養幕府的官僚人才。可見，古代日本教育大多集中于儒學和佛教經典，這些內容經過日本化過程，互相融合交織，再經過選擇加工，納入高等教育課程系統。

到幕末時期，隨着陽明學風行日本，導致了人們對後世儒學的疑惑，因此儒學家們逐漸覺得主從之忠的不合理，于是開始注重大義名分。水戶藩主德川齊昭于1833年在《告志篇》中首倡“忠孝一致”。水戶學派的學者藤田東湖提出“人倫無急于五倫，五倫莫重于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于父曰孝，于君曰忠，至于所以盡吾誠則一也”。藤田東湖(1806-1855)在其《弘道館記述義》中，闡述了忠孝的同異：“人道莫急于五倫，五倫莫重于君父，然則忠孝為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忠孝異途而同歸。于父云孝，于君云忠，至所以盡吾誠則一也。”忠孝成爲一本幕維新志士的發展，成爲尊王攘夷運動的理論基礎。這樣竭力宣傳孝，根本政治目的在於提倡忠，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培養處家行、出任盡忠。這樣以來，中國儒學日本化的過程，也就是日本社會倫理儒學化的過程。

又幕末期新設的藩校做了許多改革，由重視儒學轉變爲重視近代的實用科學。到明治時代(1868-1911)初年傳統的日本進入了“文明開花”時期。明治維新前日本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國家，明治維新後，爲適應政治、經濟、教育等發展的需要，模仿歐美的教育制度，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聘請外國的科學技術專家來日本講學，并選派自己的留學生出國留學。明治維新時期的岩倉具視還站在富國強兵的立場上，提倡對國民施以“教化”。他所提倡的“教化”，并未擺脫封建道德觀，即向民衆進行“五倫之道”的教育。在德川時代極力鼓吹社會是由神主宰，將人們劃分五倫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就是用強權推行封建制度固有的各種維護封建幕府統治的思想、道德規範。因此在教育上傳統的民族文化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教育并存。

自由民權運動發展後，明治政府日趨保守。爲清除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1879年由明治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發表《教學大旨》一文。它指出全盤西化所產生的弊病，強調了繼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文章宣布以封建德目爲教學的基本精神，攻

20) 詳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5~86頁。

擊政府成立以來輸入西方文化，進行開明文教政策的錯誤，公開提出：“自今以後，本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用以轉變國家教育的方向。應基於祖宗之訓典，專門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應以孔子為主，人人崇尚誠實品德，然後各科之學。1880年12月發布《改正教育令》，強調國家干預教育，反對人民參與教育行政。這和當時政府鎮壓自由民權運動有關。1871年7月明治政府設立了文部省，作為全國教育的領導機構，掌管全國各府縣的學校的一切教育事業。文部省按照《教學大綱》的精神，強調教育是為國家，不是為個人，實行國家主義的教育路線。1881年5月制定了《小學學校教育規則綱領》，把“修身”課從過去的末位提到第一位，歷史課以培養尊王愛國精神為目的。6月又制定了《小學教員須知》，要求小學教員教育并感化學生通曉忠皇室、愛國家、孝父母、敬長上、信朋友、慈卑幼、重自己等人倫大道。<sup>21)</sup>從此以後，師範教育越來越重視以“忠君愛國”和儒家道德為內容的德育了。

從1879年開始，潛在的儒學思想和國學思想抬頭。最重要的表現是1882年頒發的《幼學綱要》。它表現在政治上則是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開明派與以元田永孚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的鬭爭。《幼學綱要》是為對幼年兒童進行道德教育而編纂的。此書是元田永孚等專為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育而寫，內容共計有二十項德目：孝行、忠節、和順、友愛、信義、勤學、立志、誠實、仁慈、禮讓、儉朴、忍耐、貞操、廉潔、敏智、剛勇、公平、度量、識斷、勉職。每個德目都先簡單地闡述其意義，然後列出經書的幾條章句，再把日本和中國歷史上的故事各收錄五六篇。它充分地體現了儒家道德。它的宗旨，明確地表述在敕諭中，大意是：“五倫道德是教育的根本，我朝(指日本)和中國一向崇尚。雖然歐各國也有修身之學，但把它運用到我朝(指日本)還不得其要領。方今學科多端，而本末誤置者亦不鮮。年少就學應當以忠孝為本，以仁義為先。因而命儒臣編纂此書，頒賜郡下，由此得知明倫修德之要領。”<sup>22)</sup>由此可見，強調應以“忠孝為本”、“仁義為先”來進行教育，向兒童灌輸尊皇愛國思想。它否定了維新以來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為其後的國民道德教育定了基調。

1890年發布《教育敕語》，規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針。這個《教育敕語》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撰寫，文成後由天皇批准，以敕語形式公布。《教育敕語》的內容：為了

21) 參見吳延璽主編：《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頁。

22)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頁。

分析其精神實質，先將全文譯述于下：

“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也。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于此。望爾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律已、博愛及衆、修學問、習職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行公益，開辟世務，常遵國憲，時守國法，一旦危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則不苟可爲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顯彰爾先祖之遺風。”

《教育敕語》的第一段，敘述“國體之精華”在于天皇之德化與臣民之忠誠，而教育之淵源也是由此而來。第二段，列舉了十四條德目，把封建的儒家道德(忠、孝、仁、愛、信、悌等)與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道德結合在一起。這些德目的普遍意義，要求人人都必須遵守。<sup>23)</sup>由此可見，這裡特別強調了教育任務的“道德教育”和“國民基礎教育。”忠孝道德倫理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以天皇上的國體論爲基礎的忠君愛國的忠孝倫理。

《教育敕語》作爲日本教育的總綱領在戰爭中進一步貫徹執行，并作爲國民教育的基石。其內容首先明確基于天皇制的君臣關係，即“忠”是由天皇所確立的國體的價值體現。“忠”已經從應該實踐的道德觀念轉換爲不可動搖的事實了。這種教育觀是千古不變的真理。明治中期是國家主義教育成立時期。國家主義教育強調培養國家觀念和忠君愛國的道德品質。文部大臣森有禮在確立國家主義教育體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學校令把學術研究和教育分開。帝國大學是學術研究機關，中小學是一般教育機關，是培養忠君愛國的臣民的地方。這樣孝思想不僅是軍國主義教育的靈魂，而且還反映到日本的詔書、憲法、敕語和律令中，受到儒家思想很大影響。

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日本政府和軍部在教育上推行軍國主義教育政策，將教育作爲侵略戰爭的工具，確立了軍國主義教育體制。所謂“軍國主義教育”，是指日本政府和軍部爲加緊向外發動侵略戰爭，把國家置于軍事控制之下，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在教育上大力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天皇至上”，“信奉天皇”。爲培養“忠臣良民”，“盡忠報國”，將全部教育從培養目標到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方法，皆納入戰爭的軌道，建

23)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頁。

立為侵略戰爭服務的教育體制。<sup>24)</sup>1941年3月14日，公布了“國民學校令實行規則”。在學校實施皇國之道的教育，在體育科中增設武道教育的內容，借以加強軍國主義教育，施行法西斯主義統治。在小學教育中強調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因此，小學重視軍事體育教育，以便為日本帝國主義向外發動侵略戰爭，培養廣泛的軍事後備力量。從小學就進行軍事訓練，培養軍人的忠節、禮儀、武勇的思想品德。

近代以來，日本的統治階級極力推行家族國家觀，“忠孝一至”與“忠孝一本”發展成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最高準則。戰後，在美國人的壓力下，日本斷然決定從1947年開始，在三年之內逐步實行免費的“六三”義務教育制。日本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吸收引進外國科學技術的應用型人才。借鑒美國的教育體制實行了教育改革，規定小學六年和中學三年的九年為義務教育，一般稱為六三制。所以，日本的社會文化生活日趨西方化、美國化，忽略了本國的傳統和特點。1958年8月以修改文部省命令為由，正式決定開設“道德教育課”，把它作為學生的必修課。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60年代，日本強調教育的投資價值和經濟效益。這就是“能力主義”的方針指導下，學校教育過分強調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忽視了對學生的道德教育。學生機械地接受知識，師生關係成為單純的“接受”關係。同時，“學歷主義”、“考試競爭”的弊端日趨嚴重，在升學競爭中落伍的“非行”(違反校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青少年迅速增加。到60年代後期，教育家們發出防止“教育荒廢”、“教育危機”的呼聲。他們認為，必須對日本教育進行重新認識、重新評價。<sup>25)</sup>現之後的日本，受到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很大影響。盡管如此，儒家倫理文化對日本人家庭生活，職業生活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義。1983年12月提出了重視道德情操教育和教育改革七點設想之一。

總之，日本人在接受中國的儒家思想後，孝思想不僅成為人們的基本行為規範，也成為統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就是中國的家族倫理的以“孝”為核心，而日本的家庭倫理是以“忠”為核心。因此，在日本，君主的命令比家長的命令重要得多。與中國相比，中國忠是依托于孝的忠，而日本人在接受了中國儒家的孝道與“移孝于忠”的觀念以後，不僅表現出忠重于孝，而且明確提出了“忠孝一致”、“忠孝一本”的口號，並以此作為國民道德的根本。在日本人的倫理觀念中，“忠”的表現似乎更突出，但綜合考察，會發現這

24) 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頁。

25) 參見吳廷璽主編：《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6頁。

種“忠”同發端于血緣倫理的“孝”存在着密切關聯。日本儒學將以孝為中心的中國儒學嬗變為以忠為中心的日本儒學。日本的“忠”側重于對國家集團的事功，這一點在現代日本人的道德觀念中仍有痕迹。孝教思想雖然滲透學校教育，但大多停留于天皇的詔敕或官僚的奏文中，但並沒有轉變為一個民族或整個社會的價值理念，它只是維護一種政治秩序的思想資源。與韓國相比，韓國集中于孝教，而日本教育里具有對忠的濃厚的色彩。但是，孝教思想確實傳到了日本，并扎下根來，給日本社會以相當深遠的影響。

## 二、孝教的現代價值

至今，孝教思想體系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那麼是否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了呢？如果不是這樣，孝教思想存在的價值何在，對此如何解釋？像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一樣，傳統文化也有兩重性，它的正面和負面連為一體，不可分割。這就要求我們以現代科學的眼光對它的特質進行一番認真的分析，撥開其凝固的形式，吸取其有價值的內容。如何把精華部分與時代精神融合，如何把孝教納入信息化時代的文化中去，這還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 （一）孝教在現代的道德價值

今天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信息時代。社會的信息化進程使各種現代化媒體發揮教育功能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信息、熟練地運用信息都是今後人們所面臨的問題。隨着各種思潮的發展，探討信息化社會的教育內容、方法以及培養能適應信息社會的人才等的任務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更不應該忽視傳統文化之一——“孝教”。

傳統的孝觀念，總的來說是利與弊并存，但從教育宗旨、教學內容等方面來看，則應該說利多于弊，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孝教思想並不是簡單的在歷史中發生過的

事，它對人類的生活有重大意義，它是那些經歷了時間和考驗被證明是極為真實的，是人的生活所需要的東西。孝教思想包含着價值，這價值是我們的先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自覺承擔的情感責任，不斷回顧、修正并代代相傳的。

確實，現代社會的發展與傳統孝教思想之間存在差異，但是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孝教思想在過去的存在以及在未來的延續和發展呢？我們該如何在現代社會對孝教思想進行創造性轉換呢？孝教思想在未來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現在尚難預料。回首過去我們可以斷言，無論是作為中國統治階級運用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工具，還是作為經過多少世紀錘煉對中國文明發揮了深遠影響的思想體系，孝教思想的貢獻都具有永恆的價值。<sup>26)</sup>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家庭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家庭平均人口日益減少，核心家庭迅速增加。對於韓國人而言，“孝”的觀念不僅包括尊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包括尊敬他人的父母及年長者。很多年輕人其中包括大學生在內，都普遍認為，尊敬父母，聽從他們的意見是天經地義的。以前的孝單純要求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是錯誤的。孝可以調整社會的秩序。因此孝教育要從幼兒抓起。為什麼到如今我們還要提倡孝教呢？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歸納出，孝教對現代人類社會將起到以下作用。

第一，與傳統家庭相比，現代家庭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形式方面，家庭趨向小型化，當今社會，兩代人往往分開居住，開始成為家庭結構的主要形式，歷史上那種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由于獨生子女的增多，兄弟姐妹的關係也將越來越少。尤其是獨生子女所結合形成的小家庭，在贍養老人上出現了一些問題。這種格局在獨生子女所構成的家庭中就有些行不通。對於現代人來說，家庭生活已經不再是他的全部生活，在時間的比重上，甚至出現與家庭外成員交往超過家庭生活的趨勢。這樣，社會在經歷家庭的解體和重構的過程中，經受了多樣的家庭形態，不斷上升的離婚率和再婚率，爭論不休的戶主制的廢棄問題，單身家庭的不斷增加，同居

26) “價值”來源於經濟學領域，表示一定量的商品的所值。價值構成了一種文化的基本結構。通過時間不斷肯定，它就建立一種傳統或者說我們將要在下討論的傳承。價值成為個人情感生活的基本定位因素。最後，價值鼓勵和推動某一類的行為，反過來，這種行為又增強這種價值觀。經過這個過程，我們建構我們普遍的道德關懷。不管這是原初含義還是隱而不顯的含義，審視現在正在形成的觀念必須參照中國傳統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的別的特殊內涵，并創造性地關注這種傳統的未來。

現象的不斷擴散等。這充分說明了傳統的婚姻及家庭文化所經受的困惑。在家庭內部中延續着的孝，也隨着家庭的分裂趨于崩潰。家庭依然是社會的細胞。社會化大生產雖然取代了家庭生產的方式，但是家庭作為最親近的血緣實體，最有效地實踐着社會行為規範。家庭是最基本的教育場所、是兒童成長的搖籃，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師。盡孝的教育應首先從孩童抓起。從生活教育，到品德個性的培養，再到早期的智力開發，家庭教育就其廣泛性、基本性而言是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不可代替的，通過家庭來進行孝教，可以樹立符合倫理道德觀念的價值觀，進而維持和協調社會的秩序。

第二、孝教應該在一定的范疇里積極地發揮它應有的文化功能，用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方式，協調人際關係，維護家庭的安定和健康發展。因此在方式方法上，則將以教育、示範為主。提倡家庭成員互相關心，互相尊重，尊老愛幼，夫妻恩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家庭倫理道德，處理好夫妻關係、婆媳關係等各種家庭關係，把握好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自覺遵守家庭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這就為發揚孝文化、倡導家庭美德、建設幸福家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可以解決目前家庭倫理道德中存在的缺陷問題。孝教思想有助於家庭的穩定和子女的培養。在現代家庭中提倡父慈子孝，夫妻恩愛，家庭和睦，可以增強每一個家庭成員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感，有助於家庭的穩定。家庭是子女的第一課堂，對子女進行一些孝道教育，有利於他們將來在社會上接受其它道德規範。

第三、如今，校園暴力事件愈來愈嚴重，已發展成社會問題。校風是一所學校長期形成的風氣，良好的校風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良好的校風文化對師生具有特殊的凝聚力，對學生成長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在學校進行孝的教育時，應注意培養孝心，以使他們從小具有孝心，形成社會責任感，這是形成和睦的社會風尚、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措施之一。就學校的孝教實施來說，第一，學校內部各個方面應該互相配合，整體一致；第二，學校孝教與家庭孝教和社會孝教應該緊密配合，形成整體一致的良好孝教影響、輿論和風氣，在學校里充分發掘孝文化的因素。例如，給父母寫慰問信、開展孝敬長輩、慰問孤寡老人、尊敬老師的活動、讓學生繼承和發揚“孝”文化。通過各種孝教實踐活動，學校的文化生活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每個學生都在健康文化環境之中受到了文化藝術的熏陶和潛移默化的教育，在學生幼小的心里播下了“孝心”的種子。有意識地通過參與社會文化活動豐富學校生活，特別是豐富青年學生的文化

生活；要盡可能把社會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引進到校園內，豐富學校的教育教學內容，通過孝感文化促進學校的校園文化。孝不僅是德之本，也是一切教化之根本與起點。由“孝教”啓蒙，是人情陶冶、道德升華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途徑。“孝教”是道德倫理教育的基礎，把它作為幼兒道德啓蒙教育和成人道德終身教育的必修課，是合乎道德教育規律的。

第四、在現實社會中，對婚姻、兒童、家庭、社區、工作場所、市民生活的道德支配作用的社會規範正在衰弱，違背傳統道德的行為正在增多，例如離婚、未婚母親等等。其中世界各國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人口老齡化”。這是由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平均壽命的延長所導致的。老年人問題是我們所面臨的不能忽視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每個國家都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而面對這一現象，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就老年人的福利問題而言，國家理所當然要負起主要責任。國家要盡早地出台與老年人奉養相關的政策，並且開發關於老年人的就業及業餘生活的方案。這些事情固然要做，但比這個更重要的則是社會每一成員對老人的孝敬之心。當今社會，老年人的數量不斷增多，但其在家庭中的威望卻逐漸減弱。新聞廣播機構曾對這種社會現狀作了一定程度的披露。現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家庭矛盾、青少年問題、性犯罪以及各種違背常理的行為的出現，可以說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由於家庭結構的不穩定。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可以通過孝的教育，改善家庭關係，解決老齡化社會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

就社會孝教實施來說，促進民間孝文化研究組織等，積極展開對孝文化的研究與開發。孝敬父母不僅是思想家、教育家們的道德見解，而且也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從社會到家庭，“孝”作為一種社會公德，成為每個人必須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應當承担起傳播社會進步的、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孝教道德價值的責任，通過各種層次、各個方面的媒體傳導，體現孝教的基本思想。

為此，社會文化設施的建設，也要着重體現孝教的道德價值，寓教于樂，而不能僅僅從片面的，以金錢效益為目的考慮問題。社會孝教和家庭孝教也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正如學校倫理教育建立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上一樣，社會孝教也與家庭孝教相配合，否則它就有可能被架空，起碼它的影響和作用要大大減弱。在此基礎上，建一個孝教學校，使其成為弘揚孝文化的中心；孝文化的民間風情，包括民俗中的祭祀活動、

節俗中的敬老活動、婚俗中的敬拜活動、喪俗中的守孝活動等，在弘揚孝文化中、可演出一些有教益的傳統劇目。孝文化還可以為發展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社會秩序。孝文化越昌行，說明你這個地方民風淳朴，可親、可信，而社會環境之祥和，又可增加海內外投資者的信心。

通過學校倫理教育這一中介，由具體的家庭孝教上升到社會孝教所希望的水准，由社會孝教的普遍性，廣泛性具體化為家庭倫理教育，從而使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孝教三個方面統一起來，彼此支持，相互促進。從孝教的現代的價值來看，成年人的孝教可分為家庭、學校和社會三部分。這三部分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其中，社會倫理教育是現代化倫理教育的外部條件，也是家庭與學校倫理教育的繼承，三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

孝教思想未來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現在尚難以預斷。但是，回首過去我們可以斷言，孝教思想無論是作為中國統治階級運用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工具，還是做為經過多少世紀錘煉，對中國文明發揮了無以計數影響的思想體系，孝教思想的貢獻都具有永恆的價值，無論對中國來說，還是對全人類來說都是如此。傳統包含着價值，這價值是我們的先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自覺承擔的情感責任，然後經過經常的回顧、修正并代代相傳。今天，是歷史演進發展的結果，傳統文化也是一樣，如果傳統中沒有可資繼承的東西，新道德、新觀念也是無從產生的。

傳統的孝的觀念應與現代生活接軌，拋棄其中某些不符合現代價值觀念的要求。今天應該着重繼承孝的精神，着重感情上精神上給予的。隨着社會文明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我們還應將孝的範圍推廣，其對象不僅僅是有血緣關係的人，而且也包括沒有血緣關係的收養及被收養的老人和孩子。“孝教思想”在東亞國家古今的家庭、學校、社會倫理思想等傳統中居于主要地位，被視為延續祖宗生命與傳統的重要形式。孝是兒女對父母的發自內心的一種愛心。這種愛心，應該是自覺的，而不是強迫的。孝教思想本身就蘊涵着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同時孝也把體現人本主義作為其目標。因此人的教育首先要把孝作為前提。孝作為從內而外的東西，其表現形式上可能有所差異，但不管古今中外其內容却是相同的。由於時代的變遷，孝教思想比起從前弱化了許多，但其精神本質還保留在人們的心中。隨着孝成為做人的根本，它也同時是一筆文化財富。如果整個社會都孝敬父母，並且把它擴大到對待所有長輩老人，這樣的社會一定

是和睦、溫暖的。在這充滿競爭的社會中，我們更需要孝教和孝道的實行。

<參考文獻>

- 《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 〔後晉〕劉向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 〔南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 胡平生：《孝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
- 巴新生：《西周倫理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高時良：《中國教育史綱》(古代之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金其楨：《中國碑文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
- 瞿葆奎主編：《日本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魯迅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 萬本根、陳德述主編：《中華孝道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版。
- 王炳照、閻國華主編：《中國教育思想通史》(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王健：《『神體儒用』の辨析……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吳廷璆：《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 趙清、鄭城編：《吳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韓〕譯註《三國史記》，성남：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7年版。
- 〔韓〕《三國遺事》，京城朝鮮史學會，昭和3(1928年)。
- 〔韓〕古典刊行會編：《增補文獻備考》，서울：東國文化社，단기4290(1957年)。
- 〔韓〕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三綱行實圖》영인판，세종대왕기념사업회，1972년。
- 〔韓〕韓國教育史研究會編：《韓國教育史》，서울：教育出版社，1980년제3판。
- 〔日〕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
- 〔日〕池澤俊：《「孝」思想の宗教學的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版。
- 〔日〕三宅正彥著、陳化北譯：《日本儒學思想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日〕堀松武一著：《日本近代教育史》，東京：理想社，昭和34年。

[日] 蔡毅編譯：《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  
李庚子：《小學》中體現的“孝”思想，《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2期。

<국문요약>

오랫동안 학자들은 한국교육이 입시위주의 지식교육을 강조한 나머지 윤리교육을 경시해왔음을 지적했다. 이에 다양한 윤리교육을 상대적으로 강조함과 동시에 연구와 실천을 모색했다. 그러나 그동안 윤리교육 중 '효교'는 간과되어왔다. 심지어 '효교의 부재'는 자신의 부모를 죽이기까지 하는 '패륜아'에 이르는 많은 사회문제를 야기시켰다. 이러한 시점에서 우리는 전통 윤리교육 중 '효교'를 다시 한번 생각해보지 않을 수 없다.

따라서 본 연구는 전통윤리교육 중 '효교'를 윤리교육의 하나로 제시하였다. 전통 윤리사상 중 '효'사상은 오랫동안 한국뿐만 아니라 중국, 일본 등 동남아에서 문화의 중요한 구성요소가 되었다. 특히, 효사상은 유교문화권인 국가에서 핵심적인 사상이 되어 통치사상 및 도덕사상이 되었다. 본 연구는 이러한 효교가 한국, 일본에서 어떻게 진행되고 영향을 미쳤으며 나아가 현대생활에 어떤 도덕적 가치가 있는지 살펴보고자 하였다.

關鍵詞：孝, 孝教, 孝思想, 韓國, 日本